

跨越大洋的遥远呼应

——中非两大文明之历史认知与现实合作

刘鸿武

内容提要 热带非洲与东方中国的现代复兴,是 20 世纪最具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非洲分别发现了对方,发现了遥远世界的对方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虽然中非双方的历史文化背景相互有别,现代复兴之路及发展主题亦多有不同,但共同的现代命运却使双方在 20 世纪里建立起日益紧密的现代关系。最近十年来,中非关系之内容、形式与规模,正呈现出全面拓展与提升的态势。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西方主导之世界体系的演进过程后,中非现代关系的建立及发展,不仅对中国,对非洲,亦将对未来世界体系之结构与性质,产生特殊而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非洲 中国 文明复兴 现代关系 中非合作

东方中华文明与热带非洲文明,为世界文明体系中之两大文明形态。历史上,中非之间一直在克服种种障碍,相互交往与认知,但由于巨大的时空距离,这种交往与认知一直是十分有限而不易的。

然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当一个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体系初现端倪时,这两个相距遥远的世界却开始建立起一种越来越紧密的现代关系。非洲与中国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分别发现了对方,发现了遥远的对方其实是自己可以依靠的外部力量”。^①所谓“嚶其鸣矣,求其友声”,20 世纪百年之中非关系,伴随着双方现代复兴进程而一路走来,这种关系本身亦已构成双方追求复兴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从世界多元文明交往与平等对话的角度出发,在人类经历了长达数百年西

* 刘鸿武,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650091)

①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4.

方主导支配的所谓“单向度的”、“中心边缘型”的世界体系演进过程后,中国与非洲这种现代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具有特殊的象征性的,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文明交往的总体格局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即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向着“多向度的”、“网状平行型”的多元文明沟通的形态转变,而国际政治生态亦因此而开始向着一个更平等、更和谐的方向演进。

—

我们说,在世界文明之体系结构中,中国与非洲似乎各执一端,分处于十分不同的形态之中。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世界相距遥遥,天各一方,更因这两大文明之个性精神与演进过程,在其形成之早期阶段便有了种种差异与分野。相对而言,处于亚洲季风控制下的东亚中华儒家文明,本是一种建立于精耕细作之农业经济、诗书礼仪之道德教化、中央集权之统一王权基础上的东方文明,而那遥远热带大陆的非洲文明,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明,却是一种根植于自然生命之激情与活力,一种始终保留着浓厚而神奇的村社传统与部落精神的热带大陆文明。^①

在世界各大文明相互认知与交往的历史上,中非两大文明之间的直接交往,乃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非双方其实都不知对方的存在。据载,自中国秦汉以后,经由西域之大夏国和波斯高原之安息王朝,古代中国与非洲埃及、努比亚、阿克苏姆诸文明间,逐渐有了断若游丝般的间接往来,相互间有了初步的认知。^②唐宋以后,中非两大文明的直接交往开始出现,其结果,便有了诸如元代时中国旅行家汪大渊远抵赤道以南东非沿岸国家、桑给巴尔岛之旅,也有了来自北非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中国广大内地的旅行考察。透过那些星散于古代典籍中流光般的记载和现代历史学家们的探索,我们得以知道在那早已远去的岁月里中国与非洲曾有过怎样的交往努力。^③不过总的来看,直至中国宋元以前,中非之间这种断断续续的有限往来,对于当时双方文明之基本形态与历史走向,并未产生重大的或实质性的影响。

将东亚中国与遥远非洲大陆真正连接起来并在双方文明形态上留下痕迹的第一波交往力量,是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随后在公元 13—15 世纪臻于极盛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体系”的出现。那时,在印度洋周边世界,即中国人所说的“西洋”,出现了一个伊斯兰世界体系主导下的“环西北印度洋商贸文化圈”。它以印

① 关于非洲传统文明形态之特质研究,参见: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屠信译,北京: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18—229 页。

③ 参见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度洋为中心,其周边范围自西而东,包括伊斯兰化了的东非沿岸、阿拉伯半岛及红海两岸、西亚波斯湾沿岸,以及南亚印度沿海之古代国家与民族。^①在这个体系的東西两边,分别是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那时,东西拓展的伊斯兰文明,在向更遥远世界渗透的过程中,也逐渐向东传入了中国内地,向西则逐渐进入非洲内陆,从而最终使得遥远的中国和非洲大陆也程度不等地共同进入了这一“环西北印度洋商贸文化圈”的交往范围中。尽管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东亚文明体系的核心,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世界史背景下,古代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关系得以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达致巅峰状态。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公元15世纪初叶中国航海家郑和率庞大船队多次抵达东非海岸,访问那些讲斯瓦希里语的东非僧祇国的壮举。当时,那浩瀚开阔的印度洋,即中国人所称之“西洋”,成为四方商船南来北往之海路,诸番物产交易流通之海域。那西洋世界,有那么多吸引世人的江山胜迹,有那么多让世界心动的物华天宝,故而随郑和远航归来的马欢和费信,曾写下传世文献《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所记录之种种见闻景物,今人读来,亦不免心向往之。

公元14—16世纪,中华文明与非洲东部沿海之斯瓦希里文明之往来堪称繁荣鼎盛,相互影响亦达到相当的规模。比如,在斯瓦希里语中,“茶”读作“cha”,与汉语读音相近,一些非洲文化史家们认为,当时这一地区与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当有着紧密的茶叶贸易往来。有些西方考古学家们甚至这样说:“中世纪的东非历史,其实是由中国的茶叶与瓷器写成的”,^②这数百年间,东非海岸那分布着众多僧祇国家的斯瓦希里海岸,因输入中国瓷器之多,以至被西方旅行家称作“瓷器海岸”,而这却是一条见证了东方中国与非洲友好和平交往的文化商贸海岸。^③按考古学家的说法,在坦桑尼亚的基尔瓦(Kilwa),这个当年东非僧祇帝国都城的四周,“中国瓷器的碎片可以整铲整铲地铲起来”。^④事实上,瓷器只是当时中非贸易诸多往来商品中的一种。甚至到18、19世纪,兴起于东非海岸的阿曼—桑给帝国,那些权势显赫的阿曼苏丹、阿拉伯王公贵族,依然将收藏精美的中国丝绸、瓷器、绘画作品,作为象征其显赫地位的方式。^⑤

不过,随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与印度洋贸易体系让位于新崛起的大西洋贸易体系,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近代以后也就进入了冷寂期。

^① Roland Oliver and Gervase Mathew,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58.

^② Zoe Marsh and Kingsnorth,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2.

^③ 近代以来,西方人曾按照非洲出口商品和货物之不同,而将非洲沿海称之为种种“海岸”,如“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黄金海岸”(今加纳)、“奴隶海岸”(今尼日利亚)等等。

^④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第221页。

^⑤ Felix Chami and Gildert Pwiti,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Swahili World*,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

将中国与遥远非洲联结起来的第二波力量,应该说是近代以后兴起的西方扩张势力及其所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但是这一次,无论是非洲还是中国,却都已经不再是交往的主体,而是作为西方的征服对象,在卷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后开始有了间接的交往。这种关系因其外部的支配性和主导性而具有殖民地国家间接交往的性质,双方虽互相同情,相互关注,但因皆已沦落为任由他人宰割之对象,双方已无太多的实质性交往与联系。近代数百年,中非之间的往来,多为服务于西方殖民宗主国利益的劳工输送、奴仆与苦力转运,一些星散世界的华人如柳絮飘零于南部非洲及附近岛屿,成为最早流落、移居非洲的中国人。^①

二

然而,西方的殖民扩张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在将非洲与中国都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就不仅改变了非洲,改变了中国,也终究会使非洲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发生变化。

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初现端倪的 20 世纪初叶,出现了将东方中国与遥远非洲再次联结起来的时代条件与变革力量。不过,这一次中非关系的性质与内容却有了根本的不同,其交往的力量亦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中非双方内部。在追求民族独立和文明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与非洲分别发现了对方,发现了遥远的对方乃是自己国际上可以依靠的外部力量。西方的殖民统治与扩张,使得相距遥远且在文明形态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巨大的非洲与中国,却有了某种共同的或相似的“现代身份”或“时代角色”,^②有了某种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发展主题。在 20 世纪百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非殖民地化进程”、“新兴民族国家构建”、“第三世界的命运”、“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发展”等等这样一些因世界历史巨变而共同赋予中国和非洲的现代政治属性,足以冲淡东方中国与热带非洲在各自原有文明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足以跨越这两大文明原有历史发展进程之鸿沟,从而建立起一种现代意义的双边关系结构。1955 年中国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与黄金海岸(今加纳)、埃及、苏丹、利比里亚等国代表会见交流,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交,是中国与非洲这一现代关系初建的标志,而自 60 年代起非洲大陆逐渐演变为一系列全新的独立国家之后,中非关系就在现代世界这一宏观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

上世纪 60、70 年代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在许多领域都是激动人心、真诚而感人的。那是一种亚非国家间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和理想的遥远呼应,一种目标单纯而心灵相通的相互援助。对当时的中国与非洲来说,这种遥远呼应和相互援助

^① 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人华侨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p. 16.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国家,在当时超级大国或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结构中都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及回旋余地都很小,唯有联合起来才能增强各自在全球事务中发言的力度。那时,那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是如此弱小,在经济政治上几乎不存在生存自立之能力,正如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所说,“非洲要么统一,要么死亡,没有别的道路。”^①而曾经担任南方委员会主席、被称为“第三世界代言人”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当他一次又一次到中国访问后,也曾这样告诉过他的非洲同胞,仅有非洲内部的统一是不够的,非洲还需要与友好的中国联合起来,非洲才会有出路。^②他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中国加入联合国而多次慷慨陈词,奋力疾呼,因而当这些弱小的非洲国家将东方中国“抬进联合国”时,他们也就自然地把这视为自己的胜利而手舞足蹈、欢呼起舞。^③

那是一段会长久留在中非人民心中的记忆。正因为如此,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才会集全国之力,到那遥远大陆去修筑一条穿越东非大裂谷与热带雨林、由印度洋海滨港口直抵内陆深处的坦赞国际铁路。这条长达1860公里、被非洲朋友称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的国际铁路的建造,是20世纪百年中华文明为追求现代复兴而在遥远世界做出的一次艰苦努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现代交往史上,它其实更具有某种“诗史般的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在现代世界的国际关系史上,一条非西方世界间的南南合作之路已经开始启动了。^④

从现代世界体系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西方主导与支配之世界体系的演进过程后,中国与非洲这种现代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的,因为它使世界文明交往的总体格局与基本性质发生了某种意义深远的改变,向着多元方向演进的、各文明平行交往或自主交往的方向转化,标志着世界史上一个新的时代悄然到来。尽管这一过程在当时只是刚刚开始。

20世纪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⑤唯其如此,中国与非洲这一现代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这一关系之内容与性质,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现代国际政治色彩,它全然成为这两个世界在实现各自民族独立与文明复兴进程中的一种互助互援关系,它本身就是作为

① Kwame Nkrumah, *Africa Must Unite*, London, 1963, p. 218.

② J. k. Nyerere, “South-South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Uhuru* (Dar es Salaam), May 23, 1979.

③ 在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成员国权利的第二天,非洲国家掀起了一股欢乐的热潮,坦桑尼亚《乌呼鲁》发表社论称“世界历史进程将从此改写”,埃及国家电台称“这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第三世界的胜利”,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发表题为《世界史上的一天》的社论,称“这一胜利超出了联合国的范围,而成为世界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④ J. k. Nyerere, “South-South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⑤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p. 28.

20 世纪百年这两个地区所追求的现代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无论是对于非洲还是对于中国来说,建立和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其出发点与归属,都服务于各自追求现代文明复兴这一总体目标,它从根本上规定了这个时代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基本内容,并使这种关系具有一种政治主导、偏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特质。当然,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非洲,其现代文明的复兴过程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特别是对于非洲大陆来说,它进入现代文明时相对较低的历史起点,它在传统社会框架内所达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形态上,而现代中国却因近代以后的历史延宕而积累了太多需要跨越的障碍,因而在中非建立现代双方关系之早期阶段的 60、70 年代,作为极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间的那种“南南合作”的特征,便在中非关系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它使得当时中非双方交往合作的内容、规模与形式,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

三

将中国与非洲之现代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的第四波力量,出现于最近十多年,特别是最近这些年间。当代中国在经历了过去数十年的曲折反复之后,最终得以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快速成长阶段,并开始在全球化背景下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而非洲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新兴民族国家构建及统一国民文化创立的进程之后,也正在逐渐向追求现代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第二次复兴过渡。^①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中非关系开始获得了一种新的基础与动力,中非关系的性质与内容也开始更多地由政治转向经济、由政府或政治利益主导的外交关系转向市场或经济利益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兴的关系一旦启动,便在真正来自两大文明内部之变革力量的有力推动下持续推进,并使得双方关系的内容、形式与规模,开始呈现出一种全面拓展与提升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与非洲之交往关系,虽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规模,在某些领域亦有激动人心的成就且影响久远,但直到 90 年代初期,中非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官方层面或政府主导下的行为,真正深入到双方文明之内核与心灵层面的、大规模的、有双方民众参与的交往,尚处于初始阶段。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于对方之了解与认知,总体上还是较为笼统或表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中国文明与非洲文明实有巨大差异,因而普通中国民众要真正理解或体会那块热带大陆上文明

^① 关于如何全面而历史地理解和评价 20 世纪非洲大陆现代发展进程的成效得失,参见刘鸿武下述论著:《对 20 世纪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两点认识》,《西亚非洲》1998 年第 1 期;《民族国家统一构建与 21 世纪的非洲》,《西亚非洲》2002 年第 2 期;刘鸿武等:《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导论部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的基本精神与个性特质实非易事,而非洲黑人民众对于东亚中国之儒家文明及其诸般悠远深奥的礼仪教化,也难解其中趣味。事实上,较之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与接受,非洲对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则要深入得多,而这种情况,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不会根本的改变。

但与非洲文明交往,对当代中国来说,却自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它代表着另一个中国民众过去并不熟悉的生活模式与文化世界。就世界各大文明形态之交往史来说,南亚印度文明、中东阿拉伯文明和欧洲西方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和近现代时期,先后进入中国并对中华文明之进程与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唯有非洲文明,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黑人文明,历史上并未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但中国文明与非洲文明,实为世界上迥异的两大文明形态,其相互交往必有异彩之闪烁,于双方文明的丰富和更新,产生特殊的增益作用。因此,从更为广阔的人类文明发展前景来看,伴随着 21 世纪中国与非洲的复兴过程,推动中国与非洲在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层面上交往联系,于当代中国,于当代中国民众对待外部世界文明之心态变化,应该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

而就非洲大陆来说,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则同样意味着非洲可能多了一种发展模式的比较或选择,多了一种不同文明形态相互借鉴与对话的机会。自近代以来,非洲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已成西方主导之世界体系中的一个边缘性、从属性部分,非洲卷入这一体系的祸福得失,人们多有讨论,^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这数百年间,非洲始终处在一种“非洲与欧洲”、“非洲与西方”、“非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二元认知结构与关系维度的控制下,来理解自身,理解世界,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种结构下,从属西方也罢,面向西方也罢,甚至反抗与摆脱西方也罢,西方都成了非洲无可选择的选择。但是,中国的兴起及其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却使非洲在这世界格局中似乎多了一个新的关系维度,一个有所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的认知对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以民间形态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和非洲的企业和民众,各自到对方经商、观光、求学,中非关系的内容与性质正在发生某种虽缓慢但却是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未来有可能在双方文明的深层次上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认知互动,在观念、情感与文明理念等多个方位上双方发生真正意义的沟通融合。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推进,随着非洲对中国文明形态与现实发展进程之认识的加深,“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经验”^②、“中国模式对非洲的魅力”^③、“中国对非政策与非洲

① 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保罗·沃尔福威茨:《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经验》,〔英〕《金融时报》2006 年 11 月 1 日。

③ 《中国模式的魅力》,〔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 年 11 月 2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 年 11 月 6 日。

的历史机遇”^①、“中国对非洲的冲击”^②等等论题,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各国舆论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关注的领域,成为非洲新一代领导者、企业家和知识精英关注和思考的话题。如果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可以成为非洲摆脱困境的救世主,那可能就像当年认为西方可以成为非洲的救世主一样简单可笑,而中国也不会这样来定位自己在非洲的角色。但是,当代的中国与非洲,确实存在着互利互惠的巨大空间与领域,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全面发展,也确实给非洲带来了另一种机会与可能,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机会与可能。中非关系的发展前景,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非洲来说,都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开始和重新适应的新领域。

四

2006年11月在中国召开的、有48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或许是这两个相距遥远的世界在其现代交往史上最重要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接触了。这个有媒体称为“小联合国会议”的盛会及其所达成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表明中非关系在走过20世纪百年的历史进程之后,已经进入全面拓展和提升的新时期。中非的紧密对话与全面合作,乃是中非双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发展所必需的一种战略性选择。

中非关系的这一重大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样的。英国《独立报》11月4日的一篇文章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中国放到了世界外交的地图上”。文章称,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当欧洲和美国普遍忽视非洲时,中国却在非洲找到了自己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中国商人提供了即使是贫穷的非洲人也买得起的商品,并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资金,这使得中国和非洲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一直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视为只能接受援助的贫困对象,我们自己决定给它什么东西。”尽管欧美国家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不无担忧甚至敌意,但面对中非关系发展的现实,这篇文章还是不得不说:“由于中国的参与促进了非洲的发展,而且刺激我们寻找更多的富于想象力的途径,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坏事。”^③更有甚者,近年来中非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还被指责为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日本一家媒体这样写道:“非洲国家首脑一个接一个上前与胡主席握手的样子,令人联想起谒见中国皇帝的朝贡国。中国向国内外展示自己已身为非洲的新宗主国。但是,这样的合作将滋生与非

① 阿·吉奎特:《中国对非洲的新政策》,〔坦桑尼亚〕《乌呼鲁》2006年10月28日。

② 福岛香织:《欧美对中国的非洲外交加强戒备》,〔日〕《产经新闻》2006年11月5日。

③ 《中国对非洲的争夺》,〔英〕《独立报》2006年11月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1月6日。

洲特权阶层合谋榨取利益的结构,未必会使当地老百姓受惠。”这篇文章还指责中国企业生产的廉价产品充斥非洲市场,致使当地出现了利用欧美和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建设的工厂倒闭、失业者增多的现象。^①这些观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发展的复杂心态,正如西方一家媒体所说,“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新的贸易和投资渠道,对于老牌强国来说是个令人沮丧的景象。”^②

不过,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及意义进行更客观的深层次思考。来自美国的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说,中国近年的成功发展道路,“为撒哈拉以南仍在努力寻找脱贫之路的 6 亿多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的作用将日益重要。”^③一些有远见的人士已经看出,中非关系的发展,其实是向非洲和世界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中国模式”对于非洲更有吸引力。当西方媒体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所谓的中国新殖民主义危险时,非洲国家领导人却以从未有过的规模聚集北京,其实已经向世界宣示了足够清晰的信息,因为“许多参加中非首脑会议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援助和贸易的机会所吸引,他们也是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他们知道仅仅在 30 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但现在中国经济已翻了九倍。”这一切在中国是如何发生的呢?非洲国家领导人希望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许多方面挑战了西方在消除贫困、实行善治方面的主流观点”。^④而“如果说有一个大陆可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下翻天覆地,那将是非洲”。^⑤

在这里,所谓“中国模式”,是相对于“美国模式”而言的,也可称之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差别。“美国模式”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实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在中东推行的“大中东计划”,这一模式总的特点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并推行激进的民主化改造,但却很少考虑世界各国复杂的具体情况。这一模式的弱点,在于它将非洲那些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因而它往往在社会安全网建立之前就实行自由化,在管理制度形成之前就实行私有化,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⑥其结果自然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发展主题是消除贫困,因为贫困乃是造成冲突和各种形式极端主义的根源。它们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消除贫困、提供基本服务和安全的好政府,或者说,是一个可能施行“良治”或“善治”的政府。

① 福岛香织:《欧美对中国的非州外交加强戒备》。

② 科纳尔·沃尔什:《中国是非洲新殖民力量吗?》,[英]《卫报》网站 2006 年 10 月 29 日。

③ 保罗·沃尔福威茨:《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经验》。

④ 《中国模式的魅力》。

⑤ 《外国舆论积极评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人民日报》2006 年 11 月 7 日。

⑥ 《中国模式的魅力》。

从今天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先进于亚非国家,这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世界各国发展现实的巨大差异和各国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西方模式未必是最适合于非洲国家现状的。西方国家推行其制度,即便是基于善意,也还应该懂得“己之所欲,也勿强施于人”的道理。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它更多的是一种以提升民众基本生活水平、以消除贫困为出发点的渐进改革,它不是迅速摧毁旧体制,而是逐步改革旧体制,使之发生转化并加以改造利用。这种改革乃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小到大,由边缘而核心,因而能使改革之基础与空间扩大,成本较低,更为稳健。今日之非洲诸国,确实需要一个致力于发展并且有能力推行这种发展政策的政府,这是中国模式对于非洲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中国的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已经丰富了整个世界在消除贫困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探索和智慧,它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与政策。而只要美国模式不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中国模式对世界穷国的吸引力只会进一步增加。”^①

事实上,非洲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对于非洲的意义的,非洲自然不会照搬中国的经验,但他们希望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有益的东西,因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已成为近年中非合作论坛上非洲代表最喜欢使用的一句话。北京峰会提出中非在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方面展开交流,在国家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合作,体现了中非合作的领域有了新的拓展,有了更加具体而务实的内容。长期以来,非洲国家能力缺失与政府行政绩效低下,一直是一个制约非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而中国国家能力与政府意志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是理解中国当代快速发展的重要视角。此外,在处理多民族国家之复杂民族关系、宗教关系、边疆地方发展问题方面,中国的政治传统所包含的智慧,对年轻的非洲国家来说也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当然,近年来,中国自身也从与非洲的经贸合作过程中,找到了自己进入世界市场和提升自己国际适应能力的机会。^②因此,无论是对于非洲还是对于中国,用“朋友、兄弟加伙伴”来比喻当代中非关系的内容与性质,已经被认为是最适当的了。^③

20 世纪亚非国家的现代复兴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其道路艰难曲折,自非一蹴而就,一功可成,但中非人民正做着令世人尊敬的努力。一百年前,中国文明现代复兴的先行者魏源曾说过,非洲之“天文历算灵奇瑰杰,乌知异日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对非洲大陆未来之发展前景,我们当有更多的期待与信心,毕竟,我们应该懂得,历史之推演与文明之进步,总是有其内在的过程与阶段的。

① 《中国模式的魅力》。

②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取得的苏丹石油开采与加工、尼日利亚铁路网改造、刚果(金)国家电信网建设等项目,都是中国企业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投资合作项目。

③ 《非洲国家领导人谈中非关系》,《人民日报》2006 年 11 月 6 日。